

Plebeian Culture and Poetry Clubs in the Song Dynasty: A Case Study

Abstract: Poetry clubs emerged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did not flourish until the Song dynasty. The present essay is a case study of poetry clubs in the S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ebeian culture, focusing on a record in Wu Ke's *Canghai's Remarks on Poetry* of a poetry club established by Rong Ni in Jinling, whose members were primarily plebeians. The term plebeian in the present essay refers to artisans and merchants in urban c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Song, urban culture flourished more than before. Plebeian culture was part of urban culture. As a form of organization of plebeians, the various "clubs" were part of plebeian culture. Plebeian poetry clubs may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is club culture. Chronologically, this kind of poetry club constituted a developmental expansion of earlier literati poetry clubs. Contemporaneously, they may be considered a phenomenon of plebeian culture, as they belonged in the various urban clubs in the Song. Rong Ni's poetry club reflected the aspiration to, and imitation of, literati culture by well-to-do merchants at the time. In terms of its goal, structure (including its membership), location, and operation, it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at set it apart from traditional literati poetry clubs. The emergence of such a poetry club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reveals a kind of cultural upward mobility, which reflected a mutual approximation of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s, though it did not result in their complete fusion.

Keywords: Plebeian culture in the Song, poetry clubs, Wu Ke, *Canghai's Remarks on Poetry*

Author: YANG Xiaoshan received his BA from Anhui University in 1982, his MA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5, and his PhD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94.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s and Tang-Song poetic culture.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mong his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re *To Perceive and to Repres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ics of Nature Imagery*;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and *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



宋代市民文化與詩社的一個個案研究^①

楊曉山

[摘要] 詩社發萌於唐代，在宋代開始昌盛。本文從市民文化的角度來研討宋代詩社的一個個案，即吳可『藏海詩話』所載北宋元祐年間由榮倪在金陵所開辦的一個以市民為主要成員的詩社。本文中“市民”指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宋代隨著城市的蓬勃發展，城市文化更加繁榮。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作為民間組織的各式各樣的“社會”又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市民詩社可看作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和文人詩社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這種詩社從縱向來說，是早先文人詩社的擴展；從橫向來看，則可視作宋代的一種市民文化現象，是宋代民間“社會”的一種。榮倪的詩社反映了當時較為富裕的高販對文人文化的嚮往和效仿，但是從建社宗旨、組織結構（包括會員成分）、辦社場所及運作方式的角度來看，該詩社都與傳統的文人詩社大不盡同，有其獨特之處。北宋後期這一市民詩社的出現，向我們透露了當時的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向上可流動性，其結果雖不能說是雅俗文化的完全融合，卻也反映了二者的相互靠近。

[關鍵詞] 宋代市民文化 詩社 吳可 『藏海詩話』

[作者簡介] 楊曉山，1982年獲安徽大學學士，1985年獲北京大學碩士，1994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詩學及唐宋詩歌文化。現任美國諾特丹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系主任。代表著作有『感知與再現：中英詩歌自然意象說的比較研究』、『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國林與玩好』、『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等。

^① 本文源於作者為參加二〇二三年三月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年會而撰寫的英文發言稿，感謝與會同仁不吝賜教，特向以下幾位教授專門致謝：Meow Hui Goh（吳妙慧），Martin Kern（柯馬丁），Paul Kroll（柯睿），Antje Richter（李安琪），Richard 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南國學術』的匿名評審者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批評；張月教授在中文版稿件投稿過程中多有指示，謹此一併鳴謝。

引言

所謂詩社，《詞源》的定義是：“詩人為吟咏而定期結聚的社團”。^①《漢語大詞典》的定義基本相同：“詩人定期聚會做詩吟詠而結成的社團”。^②歐陽光在研究宋元詩社時曾言：“詩社活動從本質上說，即是文人交游唱和的一種形式”。^③此類說法將詩社界定於文人文化。本文旨在從市民文化的角度，探討載於吳可《藏海詩話》的一個由榮倪創辦的以市民為主要成員的詩社。下文中首先對晚唐五代至北宋元祐之前期的文人詩社做一概述，然後在市民文化的背景中簡短地揭示宋代城市中各式各樣的“社會”與詩社之間的關係，最後重點探討榮倪詩社的特點及文化意義。

一 晚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文人詩社

從現存資料來看，詩社最早出現於唐代。據說杜審言流放吉州期間曾組織過一個相山詩社。與此相關的最早的文獻出自晚明。^④這則史料的可信度大可質疑。戴叔倫詩集中有一首題為「臥病」的五言律詩，其尾聯曰：“滄洲詩社散，無夢盍朋簪。”^⑤今傳戴叔倫詩集是明人輯本，其中偽作甚多。「臥病」是否出自戴叔倫之手，目前尚不能確定，有可能是後人偽作。^⑥但是我們基本可以肯定，詩社的出現不晚於晚唐五代時期。《全唐詩》有高駢「寄鄂杜李遂良處士」詩一首：“小隱堪忘世上情，可能休夢入重城。池邊寫字師前輩，座右題銘律後生。吟社客歸秦渡晚，醉鄉漁去漢陂晴。春來不得山中信，盡日無人傍水行。”^⑦這裡的所謂“吟社”就是詩社。詩中所提的李遂良生平已無可考，只知道他是一個處士，隱居在長安西南的漢陂。高駢詩中所提到的“吟社”應該是在長安城內。高駢早年很可能在長安生活過，此時或許結識了來往於漢陂和長安之間的處士李遂良。^⑧高駢雖為武人，卻雅好詩歌，史載其人“幼而朗拔，好為文，多與儒者游，喜言理道”。^⑨高駢在「途次內黃馬病寄僧舍呈諸友人」一詩中也提到了一個“吟社”，但不知和「臥病」中所提到是否為同一詩社。^⑩

龍袞《江南野史》載五代時，孫觴、沈彬、李建勳曾結為詩社。據段雙喜考證，三人結為詩社約在後梁乾化四年（914）到後梁貞明六年（920）期間。當時李建勳之父李德誠知撫州，李建勳隨侍其父。^⑪孫觴有一首「夜坐」詩，為時人稱道，沈彬卻說孫詩“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孫觴聽了艷然不悅，沈彬半開玩笑地說，你的「夜坐」詩有這麼兩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這難道不是寫老農坐在火爐前的樣子嗎？在場所有的人聽了都大笑，誇沈彬

①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詞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詞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1-4合訂本，第1569頁。

②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7），第6567頁。

③ 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3頁。

④ [明]余之禎等纂修：《吉安府志》，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第176頁。

⑤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3077頁。

⑥ 蔣寅：「前言」，《戴叔倫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0頁。蔣寅將此詩收入「備考部份」，而“這一部份作品悉未見唐宋元選集、類書引錄，難辨真偽”；見《戴叔倫詩集校注》，第228頁。戴文進則稱“此詩應是作者在耕讀于饒州之時”。見戴文進：《戴叔倫詩文集箋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第72頁。

⑦ 《全唐詩》，第6917頁。

⑧ 高駢出身于邠州軍將世家，屬中央禁軍神策軍系統的戍邊軍家。他早年可能生活在京城。見陳尚君：「亂世能臣高駢的文學才華與人生迷途」，《文史知識》6（2019）：45；郭鵬、尹變英：《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第223頁。

⑨ [五代]劉昫：《舊唐書·高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4702頁。

⑩ 《全唐詩》，第6918頁。

⑪ 段雙喜：「孫觴生平及結詩社補考」，《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2009）：122~124；段雙喜此文後略有擴充，收入《唐宋五代江南西道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80~89頁。傅璇琮認為三人結詩社是在沈彬在吳任職期間（932-937），結社地點在金陵。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0），傅璇琮校箋，第4冊，第386~387、451~452、468~469頁。類似觀點還可見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隋唐五代卷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561頁；郭鵬、尹變英：《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230~231頁。

“能近取譬”。^①『江南野史』為稗史，自不可當正史看，然而四庫館臣稱其“可資考證”。^②此則有關孫、沈、李三人結詩社的材料多為後世徵引，其中既有『苕溪漁隱叢話』和『五代詩話』這樣的詩話，也有『十國春秋』這樣的史書。^③

南宋王十朋在箋注蘇軾「江潭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一詩時引了『九華山記』中的一段文字：“龍池菴僧清宿與張扶為詩社。四方景慕趨者如歸，皆宗九華扶詩。”^④『九華山記』為唐末五代時詩僧應物所撰。『全唐詩』小傳曰：“應物，大中時江南詩僧也……作『九華山記』。”^⑤張扶字子持，是前蜀廣都人。史載其人“博學，善文辭。武成初，凡幕府書奏牋檄，皆屬扶具草。官至兵部郎中。”^⑥由此看來，五代時期在九華山有一個頗有名氣的詩社，其成員既有世俗文人也有佛教僧侶。

晚唐五代的詩社，主要見於後人的記載。高駢並未使用“詩社”一詞，雖然他所說的“吟社”和詩社應該是一回事。孫魴、沈彬、李建勳的詩文中找不到三人結社的記載。“詩社”一詞抑或是後人用來形容三人之間的詩歌活動，他們本人或同時代人並未稱之為詩社。^⑦至於九華山的詩社，也有史料說清宿是宋代僧人，於景祐年間“主九華詩社”。^⑧根據以上有關晚唐五代詩社的材料，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結論：一、詩社的活動除了吟詩之外，還有詩評。二、除了北方的長安附近之外，南方也有詩社存在，這其中既有撫州這樣的州府，也有相對僻靜的九華山佛寺。三、從詩社的結構來說，其核心人物或為張扶那樣博學善文的名士，或為高駢、李建勳那樣的仕宦子弟，地位皆較為顯貴。詩社成員主要是士大夫之流，也包括像李遂良那樣的布衣及清宿那樣的僧侶。

詩社發萌於唐代，在宋代開始昌盛。王德明認為，“北宋到南宋初期詩社的數量並不太多，只是到了南宋中後期時才大量產生。”^⑨據錢建狀的統計，“在徽宗、高宗二朝的約60年間，先後出現過19個詩社，而從宋初至哲宗朝的約140年間，詩社僅9個。可見，文壇結社之風曾盛行於兩宋之交。”^⑩對於詩社盛行的時間的不同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界對如何界定詩社尚無共識。錢建狀統計的依據是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其中宋初至哲宗朝的9個詩社包括九老會、耆英會之類的組織，在嚴格的意義上不能算是詩社。若衡量詩社的標準是“以作詩為宗旨；有較固定之詩社社員；經常有詩社的活動”，那麼宋代有據可查的詩社“當從元豐元祐年間賀鑄彭城詩社和鄒浩潁川詩社算起”。^⑪此二詩社先於榮倪詩社，茲簡述如下。^⑫

彭城詩社約成立於元豐七年（1084），成員有張仲連（字謀父）、寇昌朝（字元弼）、陳師中（字傳道）、王適（字子立）、王玘（字文舉）等人，皆為中下層官吏。賀鑄在「讀李益詩」中首次提到了自己參加彭城詩社的活動：“甲子夏，與彭城詩社諸君分閱唐諸家詩，采其平生，人賦一章，以姓為韻。”^⑬於此可以看出詩社活動形式之一是由詩社成員分別閱讀一位唐代詩人

① [宋]龍衮：「江南野史·孫魴傳」，張劍光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第1編，第3冊，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第201頁。

②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二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第2冊，第430頁。

③ [宋]胡仔纂集：『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廖德明校點，第131頁；[清]王士禛：『五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清]鄭方坤刪補，戴洪森校點，第134頁；[清]吳任臣撰：『十國春秋·孫魴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徐敏霞、周瑩點校，第445頁。

④ [宋]王十朋：『東坡詩集注』卷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第209頁。王十朋原注作『九華山錄』。“錄”當作“記”，見[元]脫脫：『宋史·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5155頁：“僧應物『九華山記』二卷。”

⑤ 『全唐詩』，第9279頁。

⑥ [清]吳任臣撰：『十國春秋·張扶傳』，第620頁。

⑦ 參見Stuart H. Sargent, *The Poetry of He Zhu (1052-1125): Genres, Contexts, and Creativity* (Leiden: Brill 2007), p. 50, n. 95.

⑧ 見『九華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臺北：明文書局，1980），杜潔祥主編，第2輯，第22冊，第175～176頁。

⑨ 王德明：「論宋代的詩社」，『文學遺產』6（1992）：70。

⑩ 錢建狀：『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組與文學新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第164頁。

⑪ 馬茂軍：「宋代詩社與詩歌創作關係研究」，『東方論壇』1（2006）：39。

⑫ 詳見『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181～188頁。

⑬ 北京大學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第12520頁。

作品，再賦詩一首，對該詩人的平生作品作一番評論，詩的韻腳則用詩人的姓。^①之後不久賀鑄在「田園樂·序」中提到了彭城詩社另一種活動：“甲子八月，望田畝秋成，農有喜色。誦王摩詰「田園樂」，因分韻擬之，予得村字。”^②從這裡可以看出，詩社的成員在共同吟誦同一首唐詩之後，各自“分韻擬之”。吟詠古蹟也是彭城詩社活動的形式之一。賀鑄「彭城三詠·序」曰：“元豐甲子，余與彭城張仲連謀父、東萊寇昌朝元弼、彭城陳師仲傳道、臨城王適子立、宋城王犴文舉，采徐方陳迹分詠之。余得戲馬臺、斬蛇澤、歌風臺三題，即賦焉。”^③此次活動賀鑄寫了三首詩，詩社的其他成員應該也各自寫了不止一首。彭城詩社的成員雖然相對穩定，但沒有固定的活動地址。就賀鑄的記載來看，有“南臺佛祠”，^④有位於泗州之東山的張仲連的“白雲莊”，^⑤還有“彭城東禪佛祠”。^⑥

穎川詩社為鄒浩元祐初年任穎昌府學教授時所倡立。^⑦其詩社成員除鄒浩外，有苏京（字世美）、崔鷗（字德符）等四人。鄒浩有時稱之為“社”，有時稱之為“盟”。^⑧鄒浩曾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自己與其他四位詩社成員的活動：“非公家事挽人，則深衣藜杖，還相賓主。間或浮清瀨，款招提，談經議史，揖古人於千百歲之上，有物感之情與言會落於毫楮。先後倡酬，以是彌年裕如也。世美秩滿且行矣，用劉、白故事，哀所謂倡酬者，與衆自為之者，與非同盟而嘗與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穎川集』。”^⑨穎川詩社與彭城詩社至少有三點類似之處。第一、其成員為中下層官吏。第二、其成員雖固定，活動地址卻常有變換，鄒浩詩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南堂”，^⑩另外還有“曾園”，^⑪“東禪”。^⑫第三、詩社成員經常分韻作詩，文字遊戲的色彩較濃。

和晚唐五代相比，宋代有關彭城詩社、穎川詩社的材料要翔實得多。賀鑄、鄒浩所記載的都是親歷之事，且二人皆為詩社的倡導人物，其詩社活動詩所作詩篇多有保留。另外，穎川詩社的詩人作品還曾結集出版，明確地反映詩社成員的群體意識，雖然此集也包括“非同盟而嘗與同盟倡酬者”。『穎川集』雖未曾流傳下來，卻為後來的詩社作品的合集開了先河，之後不久徽宗重和元年（1118）至宣和二年（1120）間葉夢德許昌詩社的『許昌唱和集』就是一例。^⑬

二 市民文化中的社會與詩社

歐陽光在研究宋元詩社時強調，“結社風氣的盛行，乃是宋元時期最為引人矚目的社會現象之一。”^⑭歐陽光重點討論了與科舉有關的會社。本章節所關注的是宋代市民的結社。這裡首先簡單地說明一下本文中所使用的“市民”這一概念。學界在研討兩宋市民文化時一般認為，“市民”與“城市居民”的概念不可混淆，但是對“市民”一詞的確切內涵尚無共識。^⑮本文中“市

① 彭城詩社的成員有時也“互取姓為韻”，見「三月二十日遊南臺南·序」，『全宋詩』，第12522頁。

② 『全宋詩』，第12520～12521頁。

③ 『全宋詩』，第12498頁。

④ 「田園樂·序」，『全宋詩』，第12520頁。

⑤ 「題張氏白雲莊·序」，『全宋詩』，第12545頁。

⑥ 「漁歌·序」，『全宋詩』，第12500頁。

⑦ 『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185頁。

⑧ 見「呈同社」，『全宋詩』，第13986頁；「月下懷同盟」，『全宋詩』，第13995頁。

⑨ 「穎川詩集敘」，『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曾棗莊、劉琳等編，第131冊，第255頁。

⑩ 「次德符韻六詩·與德符、仲孺、述之宿南堂，分得“客”字」，『全宋詩』，第13946頁；「次德符韻六詩·南堂分韻得秋字」，『全宋詩』，第13947頁；「再宿南堂分韻得星字」，『全宋詩』，第13947頁。

⑪ 「次德符韻六詩·曾園分韻得“得”字」，『全宋詩』，第13947頁。鄒浩詩中多次提到曾園，具體何指不詳，詩社成員多次在此活動。園中有池，見『次韻德符曾家池上四詩』，『全宋詩』，第13903頁。

⑫ 「與仲孺、述之、世美東禪納涼校韓文，世美以韓公招先去」，『全宋詩』，第13992頁。

⑬ 有關許昌詩社的討論，見『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195～199頁。

⑭ 『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17頁。

⑮ 對相關論點的總結，可見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325～326頁。也有論者認為宋代的城市居民已形成一個“階層”：這些城市居民“雖有貧富的差別、職業的不同，卻因為共同生活在一座城市之中，同受商品經濟的支配，因而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共同感”。見趙伯陶：『市井文化與市民心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73頁。

民”指城市中的工商業者。^①包偉民在『宋代城市研究』一書中指出：“市井俗文化的崛起是宋代城市的新面相，這也使得它在相當程度上呈現出與前期城市不同的階段性特徵。”^②作為市民文化一部分的“社會”（亦稱“會社”）尤其值得注意。從縱向來說，我們要討論的市民詩社可以看成是早先詩社的擴展；換言之，詩社在宋代之前純粹是一種文人社團，到了北宋後期市民階層也開始構建此類團社。從橫向來看，這種詩社則可視作是宋代城市文化中“社會”的一種。

現代學者對宋代的“社會”進行了不同的分類。^③這些分類對我們宏觀上的把握固然不無裨益，但是要注意的是，宋人本身往往將各種社會並作一談。在宋人眼中，這些社會基本屬於同一大類型的組織。南宋後期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的一段記載很能說明問題。『都城紀勝』是一部記錄南宋都城臨安風情的著作，為後來吳自牧的『夢梁錄』、周密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的『繁勝錄』等開了先河。『都城紀勝』“社會”一條如下：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隱語，則有南北屋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為齋。^④又有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有方所日分。每歲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奇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⑤此社風流最勝。^⑥

耐得翁在此提到的社會種類龐雜，如西湖詩社和隱語社屬文化型，其成員當以文人墨客為主；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屬體育或武士運動型；^⑦光明會、茶湯會等屬於宗教型；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屬於藝人組織；^⑧奇巧飲食社、花果社大概是美食家們組織的；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則明顯是城中富家子弟組成的。另外還有一些五花八門的社會，如錦體（即紋身）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等。

耐得翁把西湖詩社排在眾社之首。歐陽光認為，“『夢梁錄』和『都城紀勝』中所提到的西湖詩社並非僅有一個，在南宋中後期的京城臨安，或前後、或同時存在著若干個詩社，它們各自聚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社友，頻繁地舉行唱和活動。這些詩社並非有意冠名為西湖詩社，只不過因為它們都以西湖作為詩社活動的主要場所，故習慣地以西湖詩社（西湖吟社）相稱罷了。”^⑨劉明今則認為西湖詩社是指一特定的詩社：“此西湖詩社在當時很有名，作者把它與‘蹴鞠打球

① 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的有徐勇：「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獨特性與局限性分析」，《江漢論壇》8（1991）：66；程民生：「略論宋代市民文藝的特點」，張其凡等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85頁；寧欣：「中國古代市民爭取話語權的努力—對唐朝“罷市”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3（2009）：125。呂肖煥：『宋代酬唱詩歌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第58頁（注2）。

② 『宋代城市研究』，第252～253頁。

③ 如史江就在其博士論文「宋代會社研究」（四川大學，2002）中將宋代的會社劃分為秘密性會社、宗教性會社、軍事性會社、經濟性會社、文化娛樂性會社五個大類。陳寶良在『中國的社與會』（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一書中，則將中國歷史上的社與會分成四大類：政治型、經濟型、軍事型、及文化生活型。

④ 錢南揚指出：“謎之有社，始於南宋。當時稱齋，所謂南北屋齋、西齋是也。”錢氏推測，“社謎疑即各齋所張之謎。”見『新年謎話』，《中華藝術叢刊·第15輯（錢南揚先生逸文專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朱恒夫，聶聖哲主編，第3頁。宋代盛行猜燈謎，對此較早討論有錢南揚『謎史』（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第33～62頁。

⑤ 此處耐得翁原文應句讀為“豪貴緋綠、清樂社”。緋綠和清樂分別是兩種表演形式的社團，後者亦稱“清音社”。見〔宋〕周密：『武林舊事·社會』，范瑩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第8編，第2冊，第40頁。

⑥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紀勝』，湯勤福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第8編，第5冊，第15～16頁。灌圃耐得翁真姓名及生平行事不詳，其書成於南宋端平二年（1235）。

⑦ 川弩是一種短箭，為民間打獵或比賽用具，而非軍用強弩。『水滸傳』中的燕青就是善使川弩的。

⑧ 此處“像生”指的是一種說唱形式。詳細討論可見侯寶林、汪景壽、薛寶琨、李萬鵬：『相聲釋名』，《社會科學戰線》（3）1980：295～300。

⑨ 『宋元詩社研究叢稿』，第259頁。

社’、‘川弩射弓社’、‘七寶考古社’等列在一起，足見它是一世俗化的帶遊戲性的文人組織，其性質與以前文人間偶而的杯酒唱不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甚低。”^①本文也認為西湖詩社是一特定的詩社，因為耐得翁說得很具體。南宋臨安各個時期的詩社不大可能都是由“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詩人”共同組建。

劉明今說西湖詩社“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甚低”，則與耐得翁的敘述相左。耐得翁不但把西湖詩社排在眾社之首，還專門強調，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因為該社的成員是“文士”，且“舊多出名士”。吳自牧『夢梁錄』中的有關“社會”的記載，大概是從『都城紀勝』中抄錄而來，只不過描述得更為詳細、更有條理一些。吳自牧和耐得翁一樣，以西湖詩社開頭，稱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因為“此乃行都搢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咏，膾炙人口，流傳四方”。^②於此也可以看出，西湖詩社成員“寄興適情”與劉明今所說的“以前文人間偶而的杯酒唱”並無二致，將其描述成“世俗化的帶遊戲性的文人組織”有欠妥當。（耐得翁所提到的隱語社則屬於此類組織。）但是西湖詩社不論多高雅，在耐得翁、吳自牧等人的眼中，畢竟還是臨安各種“社會”之一。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西湖詩社呈現了某種中文化意義上的向下可流動性（downward cultural mobility），反映了一種雅俗互相靠近的趨勢。

耐得翁的記載讓我們窺見了宋代詩社作為一種“社會”在都市文化中的存在。郭英德對南宋的詩社和社集之間潛在的關係曾有表述：“到了南宋，無論男女老幼、文武良賤、釋道僧俗，幾乎各行各業皆有社集。吳自牧『夢梁錄』，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等書，對杭州的社會有著詳盡描述。凡此社會，或為偶集，或為常會，有職業者，有非職業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同時詩社也更為興盛。”^③此番論述也提示了宋代俗雅文化的互相靠近。

三 榮倪詩社的特點及文化意義

宋代都市中的詩社並非都是由“文士”組建的。正如郭鵬、尹變英所指出的那樣，宋代的詩社活動呈現出普遍化趨勢：“參加詩社活動的文人涉及社會的各個階層，有權貴顯宦，也有地方官員；有江湖渴客，也有隱士僧道，甚至還有市民階層或工商業者。”^④以下重點探討一個由市民為主要成員的詩社，載於吳可『藏海詩話』：

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為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餘人不復能記。諸公多為平仄之學，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溫，嘗有「送客」一絕云：“楊花撩亂繞煙村，感觸離人更斷魂。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字不雕。僕寓京師，從事禁中，不凋寄示長篇，僅能記一云：“舊菊籬邊又開了，故人天際未歸來。”陳二叔忘其名，金陵人，號為陳角梳，有「石榴」詩云：“金刀劈破紫穰瓢，撒下丹砂數百粒。”諸公篇章富有，皆曾編集。僕以携家南奔避寇，往返萬餘裏，所藏書畫厄于兵火。今屈指當時詩社集六十餘載，諸公佳句，可惜不傳。今僅能記其一二，以遺寧川好事者，^⑤欲為詩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⑥

吳可，字思道，生活於南北宋之交。四庫館臣在「藏海居士集·提要」中說：“可事迹無考，亦不知何許人。考集中年月當在宣和之末，其詩有‘一官老京師’句，又有‘挂冠、養拙’之語，知其嘗官于汴京，複乞閑以去。又有‘往時家分寧，比年客臨汝’及‘避寇湘江外，依劉

① 劉明今：『遼金元文學史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72頁。

② [宋]吳自牧：『夢梁錄』，黃純麗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第8編，第5冊，第291頁。

③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第128頁。

④ 『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281頁。

⑤ [日]內山精也：『廟堂與江湖—宋代詩學的空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朱剛、張洵、劉靜、益西拉姆譯，慈波校譯，第223頁說：“‘寧川’，未知所指何地，但應該是與吳可深有關係的地方。”郭鵬和尹變英（『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413頁）說：寧川“今在江西撫州”，不知何據。此處寧川似指寧溪（舊稱寧川），位於今浙江台州市。

⑥ [宋]吳可：『藏海詩話』，『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丁福保編，第341頁。

汝水旁’句，知其嘗居洪州。建炎以後轉徙楚豫之間。”^①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曰：“吳思道，金陵人，以詩為蘇軾、劉安世鑒賞，官至團練使。宣和末亟挂冠去，責授武節大夫致仕，詩思益超拔。後寓新安，野服蕭然，如水雲人，其高逸如此。”^②宦官梁師成亦曾“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③據張明華考證，吳可就是吳默。^④

榮天和原籍及事迹難以考察。清朱緒曾纂輯的『金陵詩徵』中的作者小序說，榮天和名倪，字天和。^⑤從吳可的記載中可知，榮倪於元祐間客居金陵，並開設學館教人作詩。據郭鵬、尹變英的考證：“『藏海詩話』追憶榮天和元祐間在金陵學館教人作詩事……不能說明吳可當時就從榮氏學。其師從榮天和，當在其後……榮天和在元祐間‘客居金陵’後，一直在金陵。”^⑥榮倪與李之儀的文學交往頻繁，吳可在二人的關係上起了很大作用。^⑦

作為宋代市民文化中的一種現象，榮倪詩社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此詩社的地點和市民文化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詩社聚會的地點是榮倪在金陵清化市開的學館，這也不同于一般文人喜歡選擇環境幽靜優美的場所來作為詩社的聚會地點。清化市位於金陵城西北，在北門附近，是城內的一個大型集市，始建於南唐。^⑧據說宋代清化市一帶主要交易商品是家禽和水產，也是城內主要的肉類市場。^⑨陳振在論述南宋城鎮商業時說清化市“比較偏僻”，“不如其他市場興盛”，不知何據。^⑩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一般文人絕不會選擇這種鬧市區作為詩社聚會的地方。榮倪之所以在清化市開設學館，一來是因為他本人僦居于此，二來很有可能也是為了會員們聚會方便，因為這些會員中也許有很多就是在清化市開店鋪的。

第二，雖然我們對榮倪生平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他絕非達官顯貴，如果不是極為落魄至少也是不甚得志的文人。榮倪客居金陵而開設學館，應該是一種謀生手段，學館的學員估計要交些學費。也就是說，榮倪的詩社很有可能具備一些商業性因素，這和一般文人的風雅聚會有所不同。榮倪在學館開辦詩社，可謂集文化、教育空間與商業、謀生空間於一體。賀根民指出：“近世教育發展迅速，一般在中央設有國子學、太學，地方有郡學、府學、縣學，民間還有各種書院、家塾，教育的普及……客觀上造成各種賦詩結社的文學團體，促成星羅棋布的地域詩派。”賀根民以榮倪的詩社為例說明一個重要的現象：“市民作詩的現象加速了近世詩歌創作的民間化趨向，深入民間的私人教育和文學結社打造近世城市文化的燦爛景觀，它不單單提供相對充足的生活資料，還傳達出市民舞文弄墨的精神需求。”^⑪此論頗有道理。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十，第4冊，第207～208頁。相關辨析可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1426～1437頁。

② 〔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2冊，第584頁。

③ 〔宋〕孫觀：『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君墓志銘』，『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曾棗莊、劉琳主編，第161冊，第16頁。梁師成為“六賊”之一。孫觀提及吳可事奉梁師成是為了褒揚其友汪藻：“公（汪藻）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侯矣。’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梁師成）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同伍也？’”『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君墓志銘』，第16～17頁。也有認為孫觀誣陷吳可，見〔宋〕陳作霖：『金陵通傳』卷五，『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成文出版社，1985），第38冊，第145頁：“先是，可與孫觀論詩不合，及卒，觀遂誣其為梁師成黨，失其實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1428頁）也認為孫觀之言不足為信：“孫觀小人；多詆詞清流，語不足據。”郭紹虞則得出相反的結論：“是則可雖能詩，亦一諂諛小人而已。其書在宋代不甚顯，殆以此歟？”郭紹虞：『宋詩話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53頁。無論如何，吳可在京為官期間曾事奉梁師成這一點應該是無疑的。所謂“僕寓京師，從事禁中”當指此事。李之儀也曾提到吳可“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秘殿”。〔宋〕李之儀：『吳思道藏海齋記』，『全宋文』，第112冊，第182頁。

④ 張明華：『“吳可”名稱考』，『徽宗朝詩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31～333頁。

⑤ 〔清〕朱緒曾：『金陵詩征』卷五，光緒壬辰（1892）刻本，第2冊，第17頁。陸心源似乎認為“天和”是其名。〔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徐旭、李志國點校，第889頁。吳可不應該直呼老師的名字，所以應該是“倪”為名，“天和”為字。古人的名和字的意思往往互相補充。榮倪的名字可能出自『莊子·齊物論』：“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08頁。

⑥ 『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418頁。

⑦ 詳見『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414～418頁。

⑧ 薛冰：『讀南京』（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第44頁。

⑨ 南京市玄武區政府編：『鐘靈玄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第266頁。

⑩ 陳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581頁。

⑪ 賀根民：『近世易代之際的詩學觀念與文化變遷』（濟南：齊魯書社，2017），第31頁。

第三，吳可所提到的榮倪學館中的三位學生都是臨安市內的較為富足的工商業者。王莊是開酒店（酒肆）的。王松是質庫老闆。所謂質庫就是當舖。當時北方人將以物“質”錢的行叫作“解庫”，而江南人則稱為“質庫”。^①陳二叔經營角梳。所謂角梳就是用磨光的牛角做的梳子。這在當時應該是一種比較高檔的消費品。這裏可以徵引宋人王楙的記載：“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爲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裝花，初無定制。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爲妖。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爲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②正如王楙所言，仁宗朝“不得以角爲冠、梳”的禁令未能行之以久。到了元祐年間，角梳已成了市場上可以購得的商品，反映了當時“侈靡之風盛行”。經營角梳的陳二叔想來獲利匪淺。總之，吳可提到的這些小業主們生意一定都相當不錯，經濟上有了保證，想附庸風雅，提高自己的品味及社會文化地位，交一點學費對他們來說應該是區區小事。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和後來南宋晚期的江湖詩人有很大區別，儘管江湖詩人很多是布衣。江湖詩人很多窮困潦倒，爲生計而奔波于權貴之門。^③如果說很多江湖詩人是以詩討生活的話，那麼王松、王莊、陳二叔之流則可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些商販的生意應該都相當興隆，至少衣食無憂。

第四，吳可的記載中所提到的三位商販，至少有兩位取了字。開酒館的王莊字子溫；開當舖的王松字不雕。至於買角梳的陳二叔是否取了字，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吳可晚年“忘其名”，只記得他是“金陵人，號爲陳角梳”。二王取字的例子透露了市民階層嚮往士人文化的一個迹象。據吉常宏的研究，“取字原屬貴族階層的特權，後來擴展爲知識階層的事，而一般下層勞動人民還不得‘染指’。宋代還不准下層社會的人取字。到了明清時代，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幾乎無人無字。儘管也遭到文人士大夫們的抨擊和嘲諷，但取字的習俗，還是被普遍推廣開來。”^④如果此話屬實，那麼王莊、王松在當時也算是大膽妄爲了。但是吳可提到二人的字時，毫無嘲諷之意，似乎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甚至用“諸公”來尊稱這些商販。二王顯然是要效仿士人階層，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此種效仿似乎比較成功。朱緒曾在《金陵詩徵》小序中寫道：“莊，字子溫。金陵清化市人。隱於酒肆，呼王廿四郎。”^⑤按照朱緒曾的描述，王莊儼然是“大隱隱朝市”了。而實際上王莊是一位地地道道道的市井之人。郭鵬、尹變英將王莊、王松等人說成是“下層文人”，^⑥也不甚妥當。

第五，榮倪詩社商販們的效仿文人另一個舉動就是他們“皆曾編集”。市井之人自編詩集是前所未聞的。這一方面反映了“諸公篇章富有”，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商販財力殷實，能够出資自編詩集。另外，這種自編其集的做法，和我們前面所提到《潁川集》和《許昌唱和集》有所不同。詩社成員的作品合集反映了成員們的群體意識，而榮倪詩社的成員似乎尚不具備這種意識。

第六，由於榮倪詩社成員功底有限，詩社的宗旨單純、淺顯。詩社成員主要是學習近體詩的平仄聲韻。像文人詩社習以爲常的“分韻”、“次韻”之類詩作，則是其力所不及的。從吳可所舉的例子來看，詩社成員的習作似乎主要是絕句。絕句不需要對仗工整，且篇幅較短，更適合初學者。有迹象表明，詩社的成員在學詩過程中循序漸進，從絕句入手，最終發展到寫作更長的詩篇。多年後王松就曾向在京城爲官的吳可“寄示長篇”，詩中表達了對吳可的思念。所謂“長篇”一定不會是絕句了。既然榮倪詩社“諸公多爲平仄之學”，我們不妨以王莊「送客」爲例來

①〔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上》，劉宇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第5編，第3冊，第34頁：“江北人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

②〔宋〕王楙：《燕翼詒謀錄》，鍾紳整理，《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第7編，第1冊，第270頁。

③有關江湖詩人的謁客生活的討論，可參見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33～43、323～357頁。

④吉常宏：《中國人的名字別號》（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28頁。吉常宏是研究中國姓名文化的專家，言必有據。可惜此處他未提供相關資料的信息。

⑤《金陵詩徵》卷五，第2冊，第21頁。

⑥《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413頁。

審視一下他們的學習效果：

楊花撩亂繞煙村，感觸離人更斷魂。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
 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王莊的詩完全符合七言絕句的平起平收式，看來榮倪的教學還是卓有成效的。除了平仄之外，我們還可以稍加留意榮倪詩社會員們所作之詩的體裁和題材。陳二叔的「石榴」是一首詠物詩。王莊的「送客」是一首贈別詩。不論是詠物詩體還是贈別這樣熟悉的題材都很適合開始學詩之人的習作。另外我們還要注意到，由于詩社成員的學力不深，其遣辭措意都較為淺顯，詩中不用典故。以陳二叔的「石榴」詩中“金刀劈破紫穰瓢，撒下丹砂數百粒”一聯為例：從漢代開始，文人以石榴為題或在詩中提到石榴的詩文不計其數。^①但是陳二叔的這兩句顯然不含任何典故。吳可在多年後仍記得這一聯詩句並非因為它用典精當、對仗工穩，而是因為詩中以石榴籽比作丹砂，這倒不失新穎、生動。北宋蘇頌『本草圖經·玉石上品』卷一曰：“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而辰州者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耳，謂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鷄子，小者如石榴子，狀若芙蓉頭、箭鏃。”^②蘇頌只是將丹砂和石榴子的大小作了一個客觀的比較，並未將石榴比作丹砂。另外，『本草圖經』亦非文學作品。後世倒是有和「石榴」詩類似的比喻。如『西游記』第一回描寫眾猴設宴送猴王時就有如下文字：“石榴裂破，丹砂粒現火晶珠。”^③從修辭的角度來看，這和陳二叔的詩句可謂一脈相承了。

以“平仄之學”為教學宗旨的詩社並非榮倪的創舉。吳可明確說明，榮倪的詩社“似乎北方詩社”。也就是說，該詩社是有先例可循的。關於這個北方詩社，吳可的記載如下：“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屠兒為「蜘蛛」詩，流傳海內，忘其全篇，但記其一句云：‘不知身在網羅中。’亦足為佳句也。”^④吳可所說的“北方”具體何指不詳。內山精也推測是指開封。^⑤郭鵬、尹變英認為吳可此處“當不專指一家”。^⑥但從上下文來看，吳可似乎應該是指某一個具體的詩社。和榮倪的詩社一樣，這個北方詩社也沒有名稱。「蜘蛛」估計是一首近體七言詠物詩，大概是一首說教或含宗教氣息的詩。從其現存的這一句來看，「蜘蛛」詩之所以走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者乃一介屠夫，而非這首詩本身有什麼出人意表之處。

另外，吳可認為“不知身在網羅中”堪稱佳句，也許和他本人的詩歌品味有關。四庫館臣說：“其論詩每故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于習氣。”^⑦郭紹虞也說：“以其「學詩詩」證之，誠然。”^⑧吳可是宋代較早的以禪論詩的批評家。他在『藏海詩話』中寫道：“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少從榮天和學，嘗不解其詩云：‘多謝喧喧雀，時來破寂寥。’一日于竹亭中坐，忽有群雀飛鳴而下，頓悟前語，自爾看詩無不通者。”^⑨所謂“自爾看詩無不通者”恐怕有點誇張，但從這段記載看來，吳可對詩與禪之間關係的理解很可能受了榮倪的影響。吳可之所以讚賞“不知身在網羅中”一句，估計也是原詩多少有些佛禪意味。

從吳可的零星的記憶中我們可以看出，北方那種“一切人皆預焉”的詩社，在當時屬新鮮事

① 徐波，郭慧珍：『芭蕉、石榴文學與文化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第195～232頁。

② 〔宋〕蘇頌編撰：『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尚志鈞輯校，第5頁。

③ 〔明〕吳承恩：『西游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第8頁。

④ 『藏海詩話』，第341頁。

⑤ 『廟堂與江湖』，第223頁。

⑥ 『中國古代的詩社與詩學』，第414頁。

⑦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冊，第226頁。

⑧ 『宋詩話考』，第54頁。

⑨ 『藏海詩話』，第341頁。

物，否則也不會當作新聞一樣廣為流傳，連遠在南方的少年吳可也聽說了。這其中透露的一個信息就是：詩社在當時一般被看作是高雅的文人組織，與普通市民無緣。另外，吳可寫『滄海詩話』時，這種平民詩社似乎已不復存在，成了他晚年在久經滄桑之後的懷舊對象。時過境遷，舊夢重溫已不可能。吳可雖然熱切希望“寧川好事者”能創立一個類似的市民詩社，但很顯然他的號召並沒有得到響應。

像“北方詩社”或榮倪詩社那樣的市民詩社在後代鮮有記載。唯一值得一提的也許就是清代乾隆、嘉靖間的溫州“市井七才子”。清陳鏡帆（字遇春）『遇春筆記』記載了市井七才子的姓名和職業：“季碧山種菜，黃巢松充營卒，祝聖源賣茶，梅芳通販魚，計化龍為梳洗匠，周士華為鐵工，張丙光冶銀，皆習詩設社，聯吟不輟，一時有‘市井七才子’之目。其詩至今尚有膾炙人口者。”^①孫鏘鳴『東嘉詩話』曰：“余閱宋吳可『藏海詩話』，言金陵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為平仄之學，篇章富有，皆曾編集，與我鄉市井七才子，皆藝苑美談也。”^②孫鏘鳴將王松、王莊、陳二叔與市井七才子相提並論，這也從某個側面說明榮倪的詩社是市井七才子詩社的先例。二者之所以能成為“藝苑美談”正是因為這種市井之人的詩社不為多見。另外，我們基本可以肯定，七才子結社並沒受到吳可『藏海詩話』的任何影響和啟發。

結語

宋代的城市文化比以往更加繁榮，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作為民間組織的各式各樣的“社會”則又是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可所記載的詩社則可看作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這種有市民介入甚至是以市民為主的詩社與傳統的文人詩社即有聯繫，又有區別。中國傳統上稱士、農、工、商為四民，工、商為下。宋代商品經濟繁榮，工商階層隨著人數的增加，在都市的位置更加顯著。市民文化與文人文化共享城市空間，使二者的接觸更為頻繁。市民詩社是對文人詩社的一種效仿，反映了市民對士人文化的嚮往，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出現的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向上可流動性。王松、王莊、陳二叔等商販只憑着他們加入詩社、練習寫詩並自編詩集這類效仿文人的舉動，便在宋代詩歌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從建社宗旨、組織結構（包括會員成分）、辦社場所和運作方式的角度來看，榮倪的市民詩社與文人詩社大不盡同，反映了市民文化的特點。詩社的市民社員具備了兩個引人注目的條件：紮實的經濟基礎及文化上向上移動的慾望。從現有史料來看，此類市民詩社雖然在北宋晚期南北方均有存在，但在歷史上畢竟不為常見。唯其如此，吳可『藏海詩話』中的一則文化史料更顯得彌足珍貴，值得深思。

[責任編輯：張月]

① [清]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潘夢補點校，第1568頁。『全浙詩話』錄入『游甌紀聞』所載“甌婦女多能詩”三則詩話，其中周菊香曾辦過詩社：“予寓甌，有女狀元周菊香者，善詩文，解音律，結十番社、詩社于城西，一題出，唱和者多至數百人，皆閩也。”[清]陶元藻輯：『全浙詩話·外一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蔣寅點校，第1318頁。這些温州女才子是大家閨秀，不屬於本文所說的市民階層，其詩社也不屬於本文考慮的範圍。

② [清]孫鏘鳴：『東嘉詩話』，『孫鏘鳴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胡珠生編注，第662頁。